

限制投资，拜登政府再现对华遏制

从中美战略博弈的角度来说，限制投资行政令的出台，更多折射的是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困境。

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限制美国对华投资的行政令，禁止美国对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这三个领域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投资。根据行政令的内容，这一讨论至少还要持续1年时间，一年之后的2024年8月，如果那时拜登政府还能够从进入白热化状态的总统选举中抽身，这一行政令才有可能真正实施。

在实施的第一阶段，主要的政策工具是“告知”，即对华投资需要告知美国政府，并进行相应的审核，如果属于行政令要限制的范围，则投资会受到限制；需要注意的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此前在不同场合，分别多次表达了同样的意涵，即这个投资限制的清单将是“清晰”“有限的”，以及“比较小的”。从最终的实际效果看，现在能够预测有较大概率一定受到影响的，应该是上述三大领域中的初创型企业，其获得美国天使投资以及到美国股市上市筹资的渠道，预计将变得近似不可能。

从整体上来看，这一限制投资的举措是拜登政府坚持在高新技术领域对中国实施所谓“小院高墙”战略的具体落地措施之一；从具体效果来说，这次影响的，是所谓“两用技术”，具有显著的灰色特征。

从中美战略博弈的角度来说，限制投资行政令的出台，更多折射的是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困境：一方面，美国政府频繁派遣要员，从国务卿到商务部长，通过主动对华访问，希望与中国在战略互信、宏观金融、气候变化、核安全等领域取得实质性合作，不但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而且为2024年美国大选选举谋求外交加分；另一方面，美国在口头表达与中国和缓关系愿望的同时，不仅不采取行动将“不谋求限制中国发展”的承诺落到实处，还不断采取新的行动，包括制裁更多中国企业，限制对



沈逸

中国投资等，持续用行动向中国、向世界，传达完全相反的信号，显示美国不介意公然在口头表达合作愿望的同时，用行动持续损害中国的发展权等实质性的国家利益，并试图说服中国接受美国的诡辩，与美方开展务实合作。

其中展示的华盛顿的困境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美国迄今为止对华战略的调整，客观评价就是总体无效，甚至主要起到刺激中国替代能力发展的反作用；另一方面，当前的华盛顿决策圈内，既没有尼克松的政治勇气，也没有基辛格的战略智慧，只有埋头于尺寸方圆的政治精算。所以，人们看到的，是不断撞南墙，毫无回头意。这其实不仅是一种困境，更是曾经的超级大国美国在战略上“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美国政府的这种行径，不仅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而且也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在中美关系中获得显著收益的美国的各种力量，包括资本市场，正日趋接近可以忍受的底线。此前，惠誉国际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地降低美国国债信用评级，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这次降级发生在美国贝莱德以及MSCI接到美国国会反华议员国会传票的24小时内，显示这种拙劣的反华游戏，正接近实质性触碰资本核心利益的边界，问题已经不是中国能不能接受，而是资本，尤其是美国的资本，都已经快忍受不了这种为了国内政治收益毫无理性可言的胡作非为。

很显然，中国需要做的，除了坚持自身的发展之外，对于美国的倒行逆施，都应该以更加清晰、明了、直接的方式，做出正面的回应，让华盛顿错误的决策产生应有的成本和负面效应，从而推动美国早日进行相应的政策乃至战略的矫正。这不仅是对中美关系负责，而且也是对世界负责的重要体现。

这更是曾经的超级大国美国在战略上“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 [发自上海]